



瞿白音和新中国剧社的往事

□ 吕彤彬

1942年9月中，剧社利用集体前往阳朔旅游之机，进行了短期休整，并通过学习讨论，统一了社员的思想认识，确定了此后办社的三大方针，分别组成经营、艺术、生活三个委员会，以期职责分明，更有利于团体的发展。这次会上，瞿白音被选为理事长。

阳朔会议后，社员立即由杜宣、白音分别率领，离开桂林，前往衡阳、长沙、湘潭等地作历时一年的巡回公演，先后演出了《重庆24小时》《钦差大臣》《日出》《复活》《女子公寓》等剧目。当他们高举绣着社徽骆驼的红旗，胜利回到桂林时，成员已扩大到50余人，置备的道具和器材已有32只大箱之多。就瞿白音来说，这一时期他对我国现代戏剧运动的更大贡献是由他倡议后在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

1944年初，广西省立艺术馆正在筹备当年的戏剧节，瞿白音闻讯，便向馆长欧阳予倩建议，把范围扩大到西南7省，节目内容也不限于话剧，而把地方戏曲、马戏、杂技、木偶及少数民族歌舞都吸收进来，同时广泛征集有关我国戏剧运动的史料、照片、模型、实物，布置成一次前所未有的展览会。这一计划不仅取得了欧阳先生的同意，而且还得到田汉、周钢鸣、洪道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演出和展览延续达3个月之久，观众和参观者近十万人次。期间新中国剧社不仅出人出力，还在经费不敷时，连续演出看家好戏《大雷雨》和新戏《戏剧春秋》，以全部收入捐赠大会。

1944年的夏天，日寇为了在中国大陆上打开一条通道，方便军运，又调集人马，直扑湘桂。国民党队伍一触即溃，衡阳被困，桂林吃紧。当地的豪门巨富慌得席卷所有，争先恐后地溜脚逃命。但爱国进步的桂林文化界人士却

在李济深、柳亚子、田汉等领导下，组织了一次国旗献金大游行，力图振奋人心，挽救危局。新中国剧社同仁还突击创作，演出了5幕10场的大型活报剧《怒吼吧，桂林》。直至敌人越逼越近，桂林当局宣布紧急疏散，剧社才撤往柳州，在那里与四战区的政工大队会合，演出了《同盟军进行曲》。后来到了安顺，又与演剧四队合作，于1945年的元旦，演出了周钢鸣、瞿白音编写的《岁寒图》，记录并控诉了湘桂道上数十万人大溃退的空前悲剧，台下的群众看后感动得哭泣起来。新中国剧社的全班人马于5月中旬安抵昆明，在那里处境仍然很艰苦，直至8月初，剧社才获得当地警察局的批准，演出了沈浮编剧、白音导演的《金玉满堂》。

四

抗战胜利，国内局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剧社除留下一部分人员，推选导演汪巩负责主持仍在昆明演出外，其余则按计划与需要，分道东归或南下。瞿白音和13位同志先去广州，打算在那里站定脚跟，徐图演出。国民党当局多方阻挠破坏，瞿白音等虽据理力争，相持数月，工作仍无法开展，不得已按照党的指示，暂时转往香港。

解放战争期间，瞿白音等基本上都工作在海外，虽然剧社无法恢复，但大家并没有闲下来，有转入教育界和新闻出版界。瞿白音除经常搞些创作和翻译外，也曾支持私人经营的大光明影片公司，拍摄了几部好片子，如欧阳予倩编导的《野火春风》，因欧阳先生年高体弱，瞿白音代替他执行了一部分导演工作。此外他还创作了剧本《水上人家》，并把赵树理的名作《小二黑结婚》改编成电影，效果很好。大光明的老板名义

上是著名演员顾而已、顾也鲁，但经济上主要依靠卢绪章领导的广大洋行，因此，也可以说大光明影片公司是由党领导的。

瞿白音和1943年曾在广西艺术团工作过的田念董共同生活后，在香港时只租了枣梨雅道7号楼下一间斗室，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住在他们楼上的是知名演员舒适、慕容婉儿夫妇，彼此志同道合。

五

瞿白音、田念董于1950年春天从香港来到上海，经组织安排，瞿白音进入公私合营的长江制片厂，担任公方厂长。他到任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刚接受的任务上。当年长江制片厂拍成了宣传婚姻自由的故事片《两家春》，他自己还译出了苏联名剧《莫斯科的黎明》，并着手翻译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自传性专著《我的艺术生活》。

瞿白音因长期熬夜，生活习惯不规律，身体欠佳，面色发黑。1956年期间，非洲国家有些影剧工作者前来我国访问游览，瞿白音被指定担任接待工作，后来那些非洲朋友在他的陪同下到了广州，晚上当地文艺界人士开会欢迎，交谈十分欢畅。时任广东省文联主席、作家欧阳山指了指瞿白音，向邻座的司马文森说：“那位非洲朋友的中国话讲得真不错啊！”会后瞿白音知道了幽默地向欧阳山说：“鄙人早已归化中国。”

1979年9月，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开幕前夕，出席会议的通知已送到了瞿白音病榻前，他自己也极想抱病北上，与众多文艺界的老战友重新欢聚一堂，可第二天的晚上，瞿白音摔倒后卧床不起，10月1日病逝。瞿白音逝世的噩耗一经宣布，所有在场的同志无不扼腕叹息，痛悼不已。（连载下·全文完）

中共创办的第一份少儿期刊

□ 周文洋



第一份少儿期刊《时刻准备着》

1927年，中国共产党创建湘、赣、鄂革命根据地（以下简称：苏区），一些乡、村7至14岁左右的儿童少年也组成“劳动童子团”，担负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帮扶缺少劳力的红军家属操持家务、放牛砍柴、种地收田等任务。

1930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称：少共）五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儿童运动决议案》决定：苏区的少儿组织统称为“共产儿童团”，少共中央设立儿童局。

当时，苏区的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绝大多数学龄少儿不能读书。少共儿童局建立后，组织、协助各乡、村都办起列宁小学，实行免费教育。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记载：1933年，苏区建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

为提高少儿的学习兴趣、阅读能力，学到、了解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新鲜事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革命理想，少共中央决定为少儿编辑、出版一本期刊，做为学校的补充教材，学生的课外读物，满足少儿学习、成长的需要。

经一段时间筹备，1933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份少儿期刊《时刻准备着》在瑞金问世，由儿童局书记胡耀邦兼任主编，少共组宣部长刘英、分局委员陈丕显等任编辑，并特约中华苏维埃大学副校长沙可夫、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莫文华、《红色中华》报编辑李伯钊等为撰稿人。

时任少共中央书记的凯丰在“发刊词”中写道：“第一个共产主义儿童刊物在苏维埃领土上出现，这是我们苏区儿童最喜欢的事情。我们不但喜欢而且爱护他……我们应当把这个刊物发展起来，散布到每个乡村去，让每个儿童都能看到。”

《时刻准备着》辟有“社论”“新闻”“故事”“模范”“识字”“图画”等栏目，文稿短小精悍、浅显易懂，图画简洁活泼、生动形象，十分有益于启发孩子们的心智、培养高尚情操、树立革命信心。如：创刊号的封面彩印一个系着红领巾、肩扛铁锤的少年，脚下有一只喻为怪物的乌龟。胡耀邦为其配了一首儿童诗：“你们是勤苦工农的小弟弟，我们是从小做工的苦哥哥；我们都是‘皮安尼儿’（英文意为‘先锋’），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喂！你吹打打响亮的号，来，我们齐唱啦啦的歌！先努力把这些怪物打掉，再携手向鲜红的苏维埃乐园走！大家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又如第7期“新闻”栏目发表《光泽县儿童团员捉白军侦探》，写得精短通俗：“儿童团员站岗放哨不插红旗，也不扛红缨枪，而是聚在一处做游戏。这样，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放哨的，等到过路的人走近了，他们一喊：站住，检查！这时，白军侦探就是会飞也走不脱了。”

再如报道《闽粤赣省各县儿童工作的第二次竞赛》的消息，用的是儿歌文体：“第一、上杭顶呱呱！第二、汀州，难为他！第三、永定，也不差……长汀、新泉、武平……的同志们，你们跑到后面去啦，提起你们的小脚赶上前来呵！”

每期必登的“识字”栏目，都采用少儿喜闻乐见的儿歌配画形式，如识、写“狗”字，配儿歌道：“狗儿汪汪叫，见了主人跳两跳；国民党也像一只狗，见了帝国主义就把尾巴摇一摇。”

《时刻准备着》的出版，得到苏区印刷厂的鼎力支持，在纸张缺乏、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印刷厂采取缓印其它书刊、组织工人加班加点等措施，保证每期1万多份期刊按时印付，发到小读者手中。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每期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完成制版、印刷和装订的。

《时刻准备着》版面图文并茂、内容新颖生动，特别受学校、学生的欢迎，苏区列宁小学基本上每个班级订阅一份，做为辅助教材，学生们也纷纷自发订阅，据记载：上杭县才溪乡列宁小学有学生170多人，就订阅《时刻准备着》110多份。

· 书 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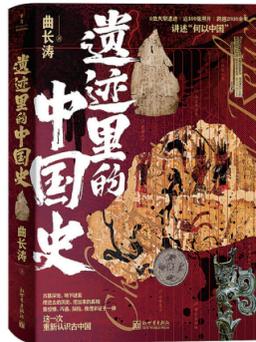
阿克塞县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发行

近日，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建县70周年大庆前夕，由省政协文化文史委和阿克塞县政协协作编的《我们一起走过》（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5辑阿克塞文史第12辑）正式出版发行。《我们一起走过》共5个板块，70余篇文字，53幅插图，25万字，用朴实的语言描绘了阿克塞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草原儿女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发展奋斗史和勇于创新、团结奋进的转型跨越史。（安妮剑）

· 书 赏 ·

从千年遗存观澜华夏至美风景——续《遗迹里的中国史》

□ 刘小兵



史地学者曲长涛所著的《遗迹里的中国史》（新世界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以悬疑的运笔，讲述了殷墟遗址、三星堆遗址、魏安釐王墓、睡虎地秦墓、马王堆汉墓、海昏侯墓等大型遗迹的发掘故事，让读者徜徉于一处处古迹现场，在察古鉴今中洞悉中国历史的生动姿容。

作者在钩沉史料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以殷墟为代表的上述六座古代遗迹遗址，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剖析。以多棱镜似的发散视角，让我们通过这些古代的遗迹遗址，去发现文物之美、感受中国历史之美。如果把这几千年遗存比作一处处旖旎的人文风景的话，那么，透过这些沧桑的历史镜像，就能在拨云见日中清晰地观澜到华夏文明的壮阔风景。全书分为六章，以每一处古代遗迹为线索，沿着众多出土文物的蛛丝马迹，讲述了文物背后的历史变迁，还原出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基本概貌。

殷墟遗址，把我们带入到古老而又神秘的商朝。本章中，作者依据现场遗址中青铜器里惊现古头颅的事件，从历史学、考古学和现代科学的角度，进行了精心的考证。书中提到的这座颇具年代感的青铜器，又叫青铜甗，是商代的一种炊具，也供祭祀之用。书中，作者借助骨骼、牙齿及锶同位素、氧同位素的分析，为我们描摹出一幅丰富而多元的古商代图景。全书结合青铜甗发现的年代，以及当年发生的军事斗

争情况，解秘了商代古老的祭祀文化和残暴的殉葬制度。亦从青铜器和甲骨文等大量文物的集中出土来看，早在殷商时期，黄河一带就已经成为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并一举奠定了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尊贵地位。

另一处驰名中外的人文风景——三星堆遗址，其出土的重要文物主要包括：六座隐藏的新祭坛、精美的权杖、古朴的青铜面具、深邃的《山海经》、奢华的黄金面罩等。自古以来，巴蜀大地就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这里不仅物华天宝，而且人杰地灵。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智慧和汗水曾创造出了底蕴深厚的巴蜀文明。然而，由于年代久远，以及相关史料的缺失，一些精彩的人文盛景，只能停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已然渐行渐远，令人慨叹不已。好在随着三星堆祭祀坑等文物的相继发现，不但大大丰富了古蜀文化的研究，而且，大量的实物例证，充分彰显了巴蜀文明的绚烂与繁华。这些琳琅满目的文物，虽然出自古老的蜀地，但它们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却深深镌刻着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业已成为全民族共同珍视的物质瑰宝和精神财富。除了上述文物之外，它们中还不乏包浆圆润的玉器、富丽堂皇的金器、高贵典雅的象牙等等。这些文物制作之精良、造型之奇巧、工艺之繁复，无一不映射出巴蜀人锐意创新的艺术匠心。通过研究这些成批次、重要级的出土文物，对深入

认识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与中原、长江中游等地的物质交流、厘清各地区相互间的文化关系，以及全面把握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与艺术脉络，都甚为关键。

至于魏安釐王墓中出土的《竹书纪年》，则是一本书写在竹筒上的历史古籍。全书共十三篇，记述了自夏到战国以来的一千八百四十七年的历史。该书对历史学、文学、文字学等学科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史学界更是盛赞它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竹书纪年》作为一本奇书，它与《史记》所记载的历史大有不同，可谓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认知。比如，它在书中所披露的古代禅让制，就远非人们想象得那样美好，而是“冰山”下面一直暗流涌动，充满了数不尽的博弈和较量。这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夏至战国时代的那段峥嵘历史。

此外，睡虎地秦墓、马王堆汉墓、海昏侯遗址，则分别诠释了先秦历史、西汉文明及贵族生活等丰富面相。尤其是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辛追夫人遗体，海昏侯遗址中发现的价值不菲的黄金、漆木器、简牍，以及孔子画像等上万件珍贵文物等，无不生动映照出秦汉时代的富丽奢华及文明风貌，从而激发起读者对亘古悠长的中华文明的挚爱。

《遗迹里的中国史》穿越时空，探索千年，以遗迹、文物、文字为魂，用何以成就中国的深意，精彩呈现出一场中华文明的至美盛宴。

漳县羴虎桥小考

□ 潘硕珍

载，明初设酒店子驿，遮阳铺。成化四年（1468年），设岷岷道，辖阶州、文县、成县、漳县四州及洮州、岷州二卫，西固一所。

很早以前，酒店子、大草滩、遮阳山、石关、羴虎桥一带森林茂密，常有虎狼鹿兔等动物出没，时有老虎伤害人畜的不幸事件发生。有诗为证：“岷州之东九十里，有驿名曰酒店子。弘治壬戌四月晦，虎夜啖（‘啖’的异体字）羊闭峒里。晓来聚观如堵堵，扼腕怒目仍切齿。黄牛问豕不能答，杀而出之曳其尾。我闻抚掌真快哉，猛虎当道安问狼与豺！只恐世间非一虎，天下苍生须父母。我铭其皮置之堂，后来鉴之其勿忘。”这首诗题名《获虎行》，作者为命成化进士王云凤，收入《岷州志·艺文志》。诗中的“弘治壬戌”年为公历1502年，是岷岷道副使王云凤

来岷的第二年。在他的督促领导下，人们用笼子关羊为诱饵，擒捉伤害人畜的猛虎，并杀死了它（明崇祯年间，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担任福建寿宁县知县，也用此法捕虎），也算王云凤的一大政绩。至此，我们这才恍然大悟，漳县羴虎桥的命名原来与王云凤有关。王云凤（1465—1518），字应韶，号虎谷，山西和顺县虎峪村人。成化二十年（1484年）甲科进士。弘治十四年（1501年）五月升陕西按察副使，奉敕整饬洮州、岷州边备。“白额”是吊睛白额的简称，是对老虎的别称，老虎额头有个“王”字，不正是岷岷道副使王虎谷么！王云凤用同样的办法杀死了铁沟桥（姑且这么称呼）附近出没的老虎。久而久之，就流传成了是“白额”将军杀死了老虎，遂将木桥命名羴虎桥。

· 丝路览胜 ·



漳县羴虎桥